



2011年美国儿童文学的最高奖项——纽伯瑞儿童文学金奖(John Newbery Medal)于1月10日揭晓,鲜为人知的美国女作家克莱尔·范德普尔(Clare Vanderpool)凭借其新作《月光照曼镇》(Moon Over Manifest, 2010)获此殊荣。

纽伯瑞文学奖始创于1922年,是为纪念英国著名出版家、儿童文学之父约翰·纽伯瑞对儿童文学的卓越贡献而设立的。此奖项每年由美国图书馆的分支机构——儿童服务协会(ALSC)组织评选金奖作品一部,银奖作品一部或数部,旨在奖励美国上一年度儿童文学领域出版的优秀文学作品,并以此鼓励作家积极踊跃地投入儿童文学创作。

在过去的90年间,纽伯瑞儿童文学奖共评选了90部金奖作品,近300部银奖作品。一般获得纽伯瑞文学奖的作品,会被归入美国青少年的必读书之列。获奖作品题材极为广泛,既有对儿童丰富的心理层面做细致入微的描写,也有表达对地球、人类及自然界万事万物的关怀

2011年纽伯瑞儿童文学金奖作品《月光照曼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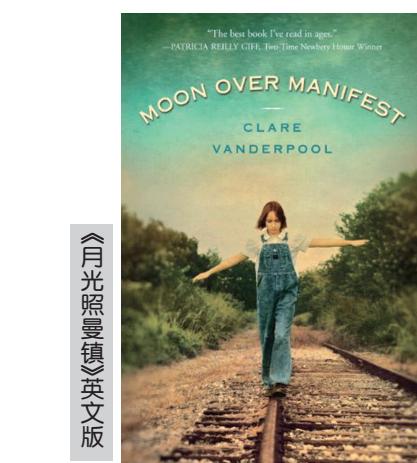
女儿自我成长的重构

□洪 娜

之情。近年来获得金奖的作品包括《当你到达我身边》(When You Reach Me)、《墓地之书》(The Graveyard Book)、《拉齐的神奇力量》(The Higher Power of Luck)、《生命交叉点》(Criss Cross)、《背井离乡的365天》(A Year Down Yonder)等等。

范德普尔在获得此奖项前一直默默无闻,其作品也从未登上任何畅销书排行榜。她与丈夫居住在威奇塔州,育有四子,是美国儿童图书作家与插画家协会成员。她于2001年一边照顾孩子做家务,一边利用休闲时间开始着手创作该小说,历时5年才最终完稿,并于2010年10月由兰登旗下的子公司德拉寇特出版社出版。

此小说以美国经济大萧条时期为时代背景,以堪萨斯州东南部的城镇和真实事件为原型,讲述1936年发生在曼尼费斯镇上的故事。女孩阿比琳自从母亲离开后,一直与流浪汉父亲吉迪恩相依为命,为生计四处流浪,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家。但是父亲对她的爱让她感觉心里很踏实温暖。他们靠聪明灵活的头脑安然度过了经济大萧条的艰难时期,阿比琳也转眼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吉迪恩决定将她送往曼尼费斯镇去度过夏天,而自己留在爱荷华州铁路上工作。阿比琳一开始有种被抛弃的感觉,她不愿与父亲分开。而且令她十分不解的是,父亲为什么把她送到这个沉闷乏味的地方来?曼镇是吉迪恩年幼时生活过的地方。那时正值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小镇煤炭资源丰富,吸引了来自20多个国家的众多移民来这里寻求新的生活。而如今,阿比琳眼前所见的这个小镇,已经随着



煤矿业的衰落逝去了往日的繁华与热闹,全镇只剩下仅有的几家店铺和少数还在苦苦坚守的居民。但逐渐地,阿比琳开始对这个充满神秘的城镇充满了好奇心。于是,她与新结交的朋友萨迪和哈蒂一道,开始了解密之旅。她们试图找到对这个城镇的秘密了如指掌的间谍莱特勒,以此来探查小镇的历史以及曾经在此发生的故事。在阿比琳找到装在这个小镇纪念品的盒子以后,隐藏在小镇以及父亲背后的秘密逐渐浮出水面。

获得纽伯瑞文学奖的作品虽大多以青少年为主要诉求对象,但主角以男孩居多,较为常见的主题涉及家庭内部父子、母子或母女的关系,而较少触及父女关系。范德普尔塑造的女儿形象阿比琳虽然早失去了母爱,但坚定的父爱培养了她独立乐观的性格,在平凡的生

活中也具有感受快乐的能力。遇事积极思考,有冒险精神,行动力强。只要她想到、想要的事,都非常执著地坚持到最后。在传统的儿童文学当中,父亲的角色通常是高高在上的家庭决策者。而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力图颠覆传统父亲角色的权威性,除去模范和高大的父亲形象,给予孩子真正了解父亲的机会,让孩子看到其卑微、脆弱、有弱点的一面,从而展现父亲的人性层面,丰富父亲的性格特征,弱化传统小说中父亲形象不可撼动的威严。而与父亲角色相比,女儿的形象则较为灵动多面,被赋予了极为鲜明的个性特征。范德普尔的这种写作策略值得欣赏和肯定。只有这样,女儿形象才有机会站在属于她的舞台上发挥其精彩的作用。同时,作者不仅重在塑造女儿勇敢独立、积极乐观、突破传统限制的形象,也呈现了其软弱无助、需要大人保护的另一层面,使得读者在移情认同主角的同时得以建立自信心,激发内心深处积极正面的力量。

12岁,对于一个女孩来说,还处在他律、接受成人指引的成长阶段,自我意识可能尚未完全确立。而这个夏天让阿比琳长大了,成熟了。阿比琳在这个夏天寻找的不只是父亲在这个小镇留下的烙印,而是这个小镇在父亲身上留下的烙印。就在这个夏天,阿比琳开始重新审视父亲,更为深刻地去了解父亲,了解他的个性和缺点,了解他的过去与创伤。正如纽伯瑞儿童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瑞奇先生评价说:“范德普尔阐释了故事对于孩子成长的重要性。孩子们可以通过故事了解过去,知晓当下,寄情未来。”

中国文论“走出去”,大致经历了由近及远、由东及西的历史过程。中国文论著作的外传,大概从唐代开始。那时,中国文学和文论经历了所谓的“自觉时期”,尤其是诗歌和诗学如日中天,光芒四射,影响到了“汉字圈”内的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国家。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日本高僧空海大师回国时,就将崔融《唐王朝新定诗格》、王昌龄《诗格》、元魏《诗髓脑》和皎然《诗议》等唐朝诗学著作带到了日本。当时,日本诗坛上正在流行着“唐诗风”。为了满足日本文人学习唐诗的需要,空海大师还先后编写了《文镜秘府论》及其简化本《文笔眼心抄》。同样,朝鲜新罗人崔致远,入唐学习和做官15年,于唐僖宗中和四年(884年)回国时,也将一些中国诗学著作带回朝鲜。从此以后,中国历代文论著作都不同程度地传入日本和朝鲜等国家。由于这些国家早期都直接使用汉字,因而中国文论著作传入这些国家不需翻译,所以很方便快捷。后来,日本、朝鲜和越南先后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字,中国文论著作的传入就要通过翻译了。诸如日本的“训译”、朝文的“谚解”和越文的“改写”、拉丁文的翻译等。这种翻译工作大约开始于15世纪中叶,直到19世纪末,所翻译的大部分是诗歌、小说和戏剧等文学作品。真正的中国文论翻译和研究则是比较晚近的事情,即从20世纪初期受到西方文论的启蒙之后。日本在中国文论的翻译和研究方面,成绩最突出,如铃木虎雄的《中国诗论史》、青木正儿的《中国文学思想史》与《中国文艺思潮论》、兴膳宏的《文心雕龙》日译与研究、高木正一的《钟嵘诗品》、丰福二郎的《六一诗话》译注、横山伊势雄的《浪花诗话研究》和船津富彦的《中国诗话研究》等影响较大。

中国文论“走出去”,大致经历了由近及远、由东及西的历史过程。中国文论著作的外传,大概从唐代开始。那时,中国文学和文论经历了所谓的“自觉时期”,尤其是诗歌和诗学如日中天,光芒四射,影响到了“汉字圈”内的朝鲜、日本和越南等国家。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日本高僧空海大师回国时,就将崔融《唐王朝新定诗格》、王昌龄《诗格》、元魏《诗髓脑》和皎然《诗议》等唐朝诗学著作带到了日本。当时,日本诗坛上正在流行着“唐诗风”。为了满足日本文人学习唐诗的需要,空海大师还先后编写了《文镜秘府论》及其简化本《文笔眼心抄》。同样,朝鲜新罗人崔致远,入唐学习和做官15年,于唐僖宗中和四年(884年)回国时,也将一些中国诗学著作带回朝鲜。从此以后,中国历代文论著作都不同程度地传入日本和朝鲜等国家。由于这些国家早期都直接使用汉字,因而中国文论著作传入这些国家不需翻译,所以很方便快捷。后来,日本、朝鲜和越南先后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字,中国文论著作的传入就要通过翻译了。诸如日本的“训译”、朝文的“谚解”和越文的“改写”、拉丁文的翻译等。这种翻译工作大约开始于15世纪中叶,直到19世纪末,所翻译的大部分是诗歌、小说和戏剧等文学作品。真正的中国文论翻译和研究则是比较晚近的事情,即从20世纪初期受到西方文论的启蒙之后。日本在中国文论的翻译和研究方面,成绩最突出,如铃木虎雄的《中国诗论史》、青木正儿的《中国文学思想史》与《中国文艺思潮论》、兴膳宏的《文心雕龙》日译与研究、高木正一的《钟嵘诗品》、丰福二郎的《六一诗话》译注、横山伊势雄的《浪花诗话研究》和船津富彦的《中国诗话研究》等影响较大。

目前,中国文论走出去存在三个问题:其一、发展不平衡。只有日本、韩国、俄国、法国和美国的汉学界对中国文论研究比较重视,积极培养人才,学术氛围也比较好,不断

都要晚于法国,而且影响也不及法国。后来,西方汉学研究中心由欧洲转向美国,美国汉学界在中国文论研究方面做出了骄人的成绩,诸如上世纪20年代张彭春的《浪花诗话》英译和研究、50年代施友忠的《文心雕龙》英译和研究、70年代刘若愚的《中国文学理论》、90年代宇文所安的《中国文论读本》等,影响较大。

中国文论文献在向域外传播的过程中,情形比较复杂。但是,从研究中发现,中国文论在向东和向西外传时,都大致经历了文化(中国文化文献1世纪开始向东传播、13世纪开始向西传播)、文学(中国文学文献7世纪开始向东传播、18世纪开始向西传播)和文论(中国文论文献9世纪开始向东传播、19世纪开始向西传播)三个时期。在文化时期,受容国的需求和关注点是文化,此时尽管孔子的诗论通过《论语》《毛诗序》《诗经》传入东方或者西方某国,各国都只关注其文化价值,而不关注其文论价值;在文学时期,受容国的需求和关注点又都是文学,此时尽管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传入东方或者西方某国,各国都只关注其文化价值,而不关注其文论价值;在文论时期,受容国的需求和关注点又是文学,此时尽管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传入东方或者西方某国,各国都只关注其文化价值,而不关注其文论价值。同时,在全球化时代里,我们要加强与域外学者的学术交流和合作,进一步团结华侨(裔)学者、域外汉学家和外国文论家,共同做好中国文论的输出工作。再者,要重视“译”、“释”、“构”。所谓“译”,即由我们自己重新翻译中国文论经典,确保原汁原味;所谓“释”,就是“以中释西”、“以中释外”,使外国读者充分认识中国文论的有效性和普适性;所谓“构”,就是立足本土,放眼世界,重构中国文论的话语和体系,使中国文论跻身国际文论界而毫不逊色,从根本上争取中国文论的“话语权”。

目前,中国文论走出去存在三个问题:其一、发展不平衡。只有日本、韩国、俄国、法国和美国的汉学界对中国文论研究比较重视,积极培养人才,学术氛围也比较好,不断

动态

“跨文化视阈下的20世纪英语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日前,由哈尔滨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杂志社联合主办的“跨文化视阈下的20世纪英语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召开。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孙和义、《外国文学研究》主编夏珍钊、哈工大外国语学院院长傅利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词,来自中国、澳大利亚、美国、新加坡等国的英语文学研究者会聚冰城,就文学理论、后现代与后殖民、女性主义作品、少数民族作家作品、生态主义文学批评、文学翻译、文化身份、叙事研究等英语文学研究领域的重点、热点问题展开讨论。

对外国作家的接受并非是单方面的,影响和决定这种接受的因素通常与接收方的文化相联系。基于这种认识,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杨金才在考察中国对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尼·莫里森及其作品的接受过程时提出,要了解莫里森在中国的接受过程,需要了解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文学意识的发展过程,对莫里森的接受因我国社会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有所区别,同时与中国读者的品位和阅读视野有关。

华中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罗良功在发言中论及了埃兹拉·庞德与兰斯顿·休斯之间的诗学关系。庞德与休斯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庞德是现代主义诗学代表,亲法西斯主义,被认为具有种族主义倾向;而休斯则是民间诗人,亲共产主义,反对种族主义。罗良功发现,两位诗人在上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期间保持着持久的通信交往,由此呈现出两人之间十分复杂的诗学关系。通过对两人书信、诗学观念以及诗学实践的梳理,罗良功认为,两位诗人之间并没有产生纯粹的影响,也非单纯的同盟或对抗,而是在微观上独立,宏观上同盟的关系,共同成为构建“美国诗学”的两个重要声音。

谈到文学中所体现的民族性和作家对文化身份的表述时,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戴从容以谢默斯·希尼为代表的几位爱尔兰作家来探讨爱尔兰性和爱尔兰民族身份。戴从容认为,不但凯尔特文化说或者杂合文化说不能真实地概括爱尔兰文化,爱尔兰语也不能代表真正的爱尔兰民族语言。戴从容分析了威廉·巴特勒·叶芝、路易斯·麦克尼尔、詹姆斯·乔伊斯等作家关于爱尔兰文化的论述,提出爱尔兰民族作为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其民族语言或民族文化同样是人为构建的。

文学作品中后现代性的不确定性一直是学界热议的话题。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李桂华在论述英国作家安东尼·伯吉斯叙事作品的后现代性及其价值时提出,后现代性在伯吉斯的作品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仅表现在叙事技术上,还表现在叙事主题上。她认为,伯吉斯的作品是艺术掩映下的哲学追问和智慧思考,外表看来是娱乐、游戏、幽默、讽刺,实质上则纵横捭阖、深邃宏阔。无论是在伯吉斯早期代表作《发条橙》中,还是在晚期的《时间力量》中,奇异的后现代叙事技术都像是“苦口良药”上的糖衣,成功地为其颠覆性作品内容起到了掩护作用。

对外经贸大学英语学院教授蒋景璇选取英国文学史上最有影响的两位批评家阿诺德和伊格尔顿的文化观与文化批评实践为对象,考察文化观在一个多世纪里的演化和变迁。在分析了两位批评家最有代表性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和《文化的观念》两部著作后,蒋景璇得出结论,文化观的式微过程是与现代民主化的政治历史大语境紧密联系的。我们在赞同民主的同时,也要努力提高民众的高雅文化意识,提高他们对文学艺术的审美趣味,而不能简单地把一切文化现象都与政治挂钩,不能盲目地媚俗和迁就低级趣味。蒋景璇提出,在振兴文学研究的过程中,必须回归经典和具体文本的研读,而不能跟从后现代主义那摧毁一切正典的做法。

生态主义文学批评在近年来一直是外国文学研究的热点话题。在此次研讨会上,有多位学者从生态批评的角度解读了英、美、澳大利亚等国作家的作品。如厦门大学的林斌以E.B.怀特的代表作《重游缅湖》为例,探讨了作品的生态内涵。林斌从该篇散文创作的历史文化语境入手,在生态意象、生态环境、生态叙事等三个层面解析了怀特对自然的生态书写,认为在《重游缅湖》中,怀特在生存的终极层面上探寻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生生不息、绵延不绝的生命之链。

与会者表示,此次会议聚集了国内外英语文学研究领域的众多学者,搭建了一个交流创意和思想的平台,研讨过程中经常出现学术思想的碰撞,对今后的研究工作很有助益。

(王杨)

瞭望台

因为距离,所以新鲜 ——读彼得·海勒斯的《寻路中国》

□来颖燕

都说距离产生美感,事实上,因为距离而产生的不仅仅只有美感。距离的存在,往往会让人们在看待事物时拥有新的视角和眼界。这种情形,当人们在记录自己身处他乡的经历时会尤为明显。因为异乡人的身份天然地赋予了其与当地人迥然的文化背景和感知力。这种因为差异而形成的距离,会让一个异乡人在陌生土地上的所见所闻充满惊奇和新鲜感。

《寻路中国》,记述的就是一个中国人在中

国大地上的奇特经历。如果把该书划归为旅行文学,其实并不妥帖。作者彼得·海勒斯是《纽约客》的驻北京记者,被誉为是“关注现代中国的最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他踏上中国的土地并非是为了观光,中国的现实问题及其背后的深层密码深深地吸引着他,并促使他开始筹划这次独特的探索之旅。2001年,海勒斯在北京租了辆汽车,并由此开始了长达7年的驾车漫游中国的旅程。

选择这样驾车环游捕捉现代中国的方式,本身颇为耐人寻味。海勒斯漫游的这7年正是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期。于是这7年的神奇之旅仿佛在一一开始就切中了当代中国现实的某一基底。“寻路”一词,便也显得语义双关——既指海勒斯此次在中国大地上飘荡的旅程,更饱含了对于当代中国何去何从的感悟。



全书条分缕析地分为三部分:“城墙”、“村庄”和“工厂”。“城墙”叙述了海勒斯从东海之滨沿着长城一路向西,横跨中国北方的万里行程;“村庄”讲述了一个因中国汽车业的高速发展而发生巨变的乡村,并特写了一个农民家庭由农而商的文化变化;“工厂”则描绘了中国东南部一个工业小镇的城市生活场景。细看下来,书中所描述的这种由农而工、乡村变城市的发展,正是1978年改革以来中国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海勒斯选择这些切入点和考察对象,单刀直入又发人深省,仿佛一下子厘清了中国大地上那些纷繁的发展历程中的块面图。

而海勒斯的写作方式更是令人钦叹。虽然讨论的是看似宏大的中国核心问题,却丝毫没有大而无当之感。因为海勒斯搜集材料的方式是深入体验——尽可能地亲近当下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所以所有的感悟都是如此真实细腻而平易。更重要的是,他异乡人的身份让这样的体验更具有了别样的意味——在深入的同时自然地保持了一种“间离”,对许多当地人已经司空见惯的问题,具有非同一般的敏感性。比如,他对于中国男人的“香烟”文化的看法——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像香烟那样有抓住“关系”的神韵;对于中国乡村随处可见的大树“标语”的感知;对于《中国地图》已然跟不上发展现况的思考……而海勒斯自身对于中国文化和历史的深厚积淀,更让他的旅程记录旁征博引,意趣和哲思并存。比如,在前往成吉思汗陵的过程,他会想到在《成吉思汗和现代世界的形成》一书中历史学家们对于蒙古人战略思想的思考,对于中国人信奉宗教心态的实用主义分析等等。当然,他的旅途中也遇到了诸多富有“中国特色”的事件,比如旅游纪念品商店里上演的“碰瓷”。这些对于我们而言再熟悉不过的一切在海勒斯的笔下,迸发出奇趣而新鲜的意味,让人读起来欲罢不能。但读罢掩卷,这些有趣精彩的旅程轶事背后蕴藉的意味却并不轻松。它们触碰的是中国现实社会中许多业已沉积的状况,在我们眼前展开的是一幅文明边被毁灭边被创造的画面。而海勒斯有“距离感”的视角和身份,让我们跟随他获得了一种新的眼光,重新发现和看待这些本已被忽视的问题。

毕加索当年凭借非常常人的现代艺术家眼光,从非洲木雕中获得灵感从而创作出立体主义的诸多传世名作,而他对于非洲木雕的认识则带领人们重新发现了非洲木雕已被忽视的艺术性。同样,海勒斯对于中国问题的看法,赋予了我们一种“有距离”的眼光,看到了一个“真实”的中国。如有评论所言的:“何伟(海勒斯的中文名)的笔下是真中国,是连一些生活在中国的青年人都不知道或拒绝认识的中国。”

言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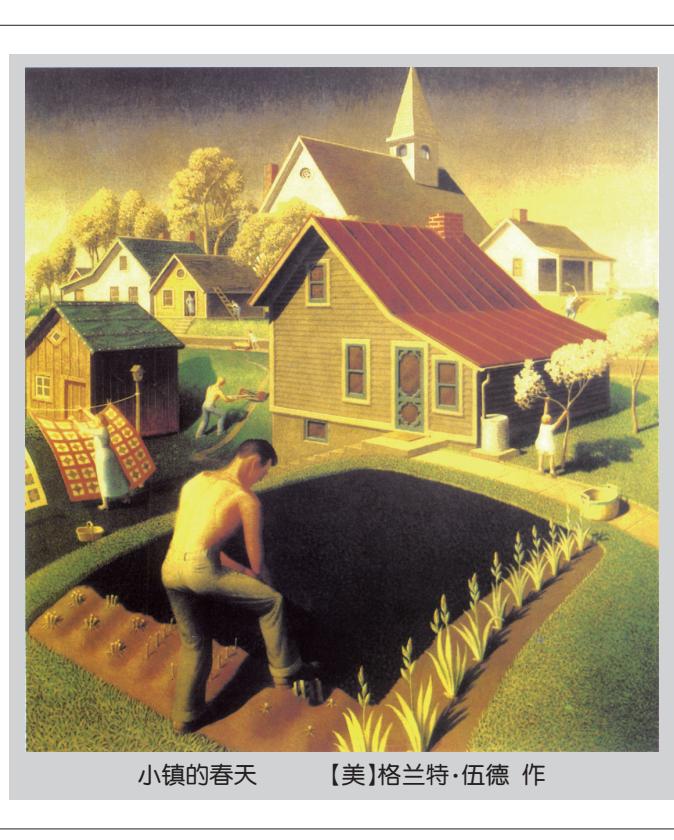
中国文论如何走出去

□古 风

都有晚于法国,而且影响也不及法国。后来,西方汉学研究中心由欧洲转向美国,美国汉学界在中国文论研究方面做出了骄人的成绩,诸如上世纪20年代张彭春的《浪花诗话》英译和研究、50年代施友忠的《文心雕龙》英译和研究、70年代刘若愚的《中国文论读本》等,影响较大。

中国文论文献在向域外传播的过程中,情形比较复杂。但是,从研究中发现,中国文论在向东和向西外传时,都大致经历了文化(中国文化文献1世纪开始向东传播、13世纪开始向西传播)、文学(中国文学文献7世纪开始向东传播、18世纪开始向西传播)和文论(中国文论文献9世纪开始向东传播、19世纪开始向西传播)三个时期。在文化时期,受容国的需求和关注点是文化,此时尽管孔子的诗论通过《论语》《毛诗序》《诗经》传入东方或者西方某国,各国都只关注其文化价值,而不关注其文论价值;在文学时期,受容国的需求和关注点又都是文学,此时尽管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传入东方或者西方某国,各国都只关注其文化价值,而不关注其文论价值;在文论时期,受容国的需求和关注点又是文学,此时尽管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传入东方或者西方某国,各国都只关注其文化价值,而不关注其文论价值。同时,在全球化时代里,我们要加强与域外学者的学术交流和合作,进一步团结华侨(裔)学者、域外汉学家和外国文论家,共同做好中国文论的输出工作。再者,要重视“译”、“释”、“构”。所谓“译”,即由我们自己重新翻译中国文论经典,确保原汁原味;所谓“释”,就是“以中释西”、“以中释外”,使外国读者充分认识中国文论的有效性和普适性;所谓“构”,就是立足本土,放眼世界,重构中国文论的话语和体系,使中国文论跻身国际文论界而毫不逊色,从根本上争取中国文论的“话语权”。

目前,中国文论走出去存在三个问题:其一、发展不平衡。只有日本、韩国、俄国、法国和美国的汉学界对中国文论研究比较重视,积极培养人才,学术氛围也比较好,不断



小镇的春天

[美]格兰特·伍德 作

世界文坛

书讯

二阶堂黎人《双面兽事件》中译本出版

本报讯 日前,新星出版社出版了日本推理作家二阶堂黎人的作品